



### 重现云冈之美

2010年左右,王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踏入武州山麓。仰头望见云冈石窟的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词:震撼。此后十多年间,他总共去了七八次。每次都能有新的发现,仿佛石头自己也在生长。

写《千年一窟看云冈》之前,王凯已经从事艺术行业二十多年。他曾花七年时间系统梳理了从佛陀到南北朝晚期的佛造像演变脉络,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看过他的书说,“给人以美的享受。”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1500多年前郦道元陪侍孝文帝巡游武州山石窟后,记载在《水经注》中的文字。武州山石窟就是今天的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拓跋焘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统一北方,开启南北朝时期。北魏建国后,西来佛教逐渐成为皇家信仰。在北凉高僧昙曜主持下,一项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开始营建,云冈石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皇家开凿的大型佛教石窟寺。

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奠基人宿白先生曾提出“云冈模式”,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建。“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痕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段,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之首,云冈太重要了,“是整个中国石窟艺术脉络的重要节点。”可在公众认知里,云冈好像一直不如敦煌,龙门出名。敦煌有九色鹿、飞天、有常书鸿、樊锦诗;龙门有卢舍那大佛,有书法龙门二十品、武则天。云冈呢?似乎也有,但并不出圈。

市面上关于云冈的读物两头重,中间轻。一头是学术著作,晦涩难懂,或是大型图册,动辄几十本,又沉又贵;一头是百度百科式的旅游丛书,蜻蜓点水,不够深入。能让普通人看懂,又能讲出北魏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书,几乎没有。王凯想,“只用一本书,展现云冈石窟1600年的美。”

这一写,就是四年。他的搭档是摄影师杨超。2013年云冈研究院启动数字化工程,杨超作为官方邀请的摄影师,对石窟进行无死角的拍摄记录。云冈夏天不算太热,但冬天零下20度的严寒让给相机罢工歇业。每天进窟前,杨超除了检查设备,还要准备一瓶烈酒御寒。就这样整整三年,他拉着沉重器材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大同,拍了差不多20万张照片。

王凯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惊呆了,打开层层嵌套的文件夹,按窟号、壁面、层数分类,“光打开那些文件夹都要好久,手都点麻了。”

如今云冈旅游火爆,石窟内人潮汹涌,很多洞窟因修复关闭。这样大规模近距离的拍摄几乎无法复制。书里选了400张照片。从20万张图片挑400张,“舍得是一件特别反人性的事”,王凯和杨超只能一遍遍删,一遍遍取舍。

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王凯也有意外的发现,比如一张第18窟内的照片,和1920年德国摄影师库尔特·沃尔夫·维拉格拍摄的角度几乎完全一样。那张老照片里,有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在窟内住宿。通过两张照片对比,能看见历史变迁,看见文物在不同时代的状态。王凯觉得奇妙无穷,“那些冰冷的石头,忽然就和一百年前的人发生了关系。”

从动笔之初,王凯就想用手绘插画的形式为云冈石窟绘制一幅全景图。直到真正着手时,才发现远比设想艰难。他搜集了从有影像记录开始120多年来,能找到的绝大部分有关云冈的影像资料作为绘图参考。但部分区域的照片与现在的窟区比变化太大,不能反映目前的景观;有的图像拍摄角度过于仰视,无法用平视的角度描绘;有的洞窟加盖了木构窟檐,窟体已被完全覆盖……为了能尽量客观真实地呈现,绘制每一个洞窟时,王凯都要和插画团队多次分析影像,确定方案后才动笔。绘制中不断比对、讨论、修改。当前的细节无法判定时,他们甚至从北京驱车赶往大同,实地拍摄测量。也多次因图片尺寸过大导致电脑宕机、系统崩溃,甚至图片丢失,从头再来。

就这,从构思到收笔,这幅全景图耗费了一年半,最终长达4米。它完整描绘了东西绵延1千米,包含45个主要洞窟的云冈胜境——“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写书的四年,王凯的生活挺单调。别人聚会吃饭,他在电脑前码字,或者查阅资料,“痛并快乐着。”他需要研读大量史料,像福尔摩斯一样抽丝剥茧。每一个洞窟,每一尊雕塑,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他不想只解释这根线为什么这么刻,那个衣纹为什么那样飘。

他想知道的是,1600年前,那些胡人、汉人、僧人、贵胄、西域工匠,在武州山的崖壁上凿出这些洞窟时,他们在想什么。

### 黄河边的种子

王凯生在黄河上游的兰州,他笑称自己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王凯：唤醒沉默的云冈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本报实习生 杨佳庆



那是另一个时代:文物还没有被围栏围起,人甚至能与佛像共处一室。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显示,一个老头牵着一个小孩就住在云冈石窟内。

住进去的人与如今排队参观的人,中间横亘着一百年。一百年里,看石窟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千年一窟看云冈》作者王凯觉得,只要还有人愿意驻足,这些石窟背后的人和事,就没有随时间流走。

合,意义深远。但从权力格局去看,原因不止于此。

云冈石窟的营建跨越六十多年,分为三期。第一期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各自独立。到了中期,突然涌现出大量“双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皆成对开凿。

王凯发现,这与北魏宫廷的权力格局息息相关。孝文帝即位时年幼,祖母冯太后临朝称制,权势达到顶峰。太和五年,孝文帝与冯太后出巡中山(今河北定州),敕建五重塔。20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从塔基下出土的舍利函上,发现了一段刻着“二圣”的铭文。这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冯太后已被正式承认为与孝文帝并列的最高统治者。

“二圣”的出现直接左右了云冈营建。开窟的人犯了难:既要为皇上祈福,又要为太后开光。释迦牟尼出生时,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这时候,却需要“唯二”的出现。

为皇家服务的高僧们翻遍佛经,终于在《妙法莲华经》中找到一个故事:多宝佛曾发下大愿,待他灭度后,凡有宣讲《法华经》之处,必有一座宝塔从地中涌出,以证此经真实不虚。一次法华会上,释迦牟尼正在说法,七宝塔果然从地心涌出,多宝佛于塔中端坐,并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二佛并坐说法。

这为“二圣”的统治格局提供了宗教上的理论依据。于是,云冈中期洞窟中,“二佛并坐”的造像大量涌现。据王凯粗略统计,在第1至15窟中,便出现了74处之多。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政治,去石窟看一眼就过去了,只觉得这地方雕了一个佛,那地方雕了两个佛而已。”王凯说,“作为皇家石窟,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随意雕凿的。”

迁都洛阳也是如此。孝文帝能够在冯太后去世后,迅速作出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除了意欲统一中国,继续深化汉化改革以外,也与他个人的情绪有着莫大干系。孝文帝亲政后,冯太后经营数十年的政治集团势力依然强大,处处掣肘,“而 he 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压抑、掣肘的氛围,才迫不及待作出迁都的决定。”

从山西平城迁都河南洛阳,一千四百里的路途,不仅有崎岖的山岭和未卜的前程,也一路播撒了“云冈模式”的种子。南涅水石刻、巩义大力山石窟、偃师水泉石窟……都能隐约窥见云冈的影子。那是权力的余波,也是艺术的流变。

### 石窟路上的守望

在石窟寺田野考察的路上,王凯常被两样东西触动:古代工匠创造的辉煌艺术,那些用一生守护这些艺术的普通人。

2023年,他在洛阳偃师水泉石窟遇到了76岁的师长捷。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水泉村人,1978年起义务守护石窟,46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20世纪90年代石窟两次被盗凿佛头,他养狗看护,发现盗贼对付狗比对付人还有经验。媒体报道后,文物部门拨了两千块钱,他用来焊了个铁栅栏,把石窟锁起来,有人参观再开门。王凯去的那天,龙门石窟有几万人游览,而水泉村的,他们只是第二拨游客。

此前,文保所为奖励老人看护石窟决定每月补助他400元,但已经8个月没发过了。这些一点没影响他对石窟的激情讲解和细心看护。老人说儿孙都很好,但各有各的事,估计没有人来接他的班——他应该是水泉村最后一位石窟守护人了。

像师长捷这样的守窟人不在少数。川渝的安岳,大足石窟群,就有很多类似的无

名守护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游客眼中的景点对他们来说是童年的居所,日常的生活,融进血脉的记忆,是奋力护卫的“亲人”。这样的守窟人,一代接着一代,守护了1600年。

1932年,曾将龙门石窟《文昭皇后礼佛图》碎片整理运输至美国的劳伦斯·史克曼来到山西大同,想看能否买到一些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塑或残件。但因云冈村民已自发对古迹严加守卫,盗凿之事鲜有发生,史克曼百般搜求,也只得到了一枚陶眼。正因如此,云冈石窟成为那个动荡年代里,相较于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被保护得较好的北朝石窟群。这枚陶眼,之后也成为回归云冈的第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

这些人,这些石头,这些故事,都在告诉王凯:他正在走的这条路,有人已经走了一辈子。

如今,这条路正被更多人看见。今年春节期间,云冈石窟因游客爆满连续多日限流,年轻人打卡看展成了标配。但王凯也在思考,“参观古迹的人中,有多少是为了文物本身,又有多少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毋庸质疑的是,文化和艺术正在变成年轻人的“社交资本”,这在古代是阶层象征,在民国是教育资本,而今天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审美标签。

“文化的繁盛当然是好事”,他想,“当文化进入生活之后,是否还能保持一定的深度?还是仅仅停留在表面?”

这也是他写下一本书的初衷,写丝绸之路路上的人,丝绸之路不仅是书本中金光灿灿的高道,更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苦难与信仰之路。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敦煌时曾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走到莫贺延碛,“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绝命。”王凯想从微观史的视角呈现这条拥有两千年悲怆历史的信仰之路,这些具体的人,有中国的,有波斯的,也有中亚、西亚的,还有欧洲的。“真实的丝绸之路,是一片望不到尽头,被季风和流沙统治的荒原。在荒原上行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那天夜里离开水泉石窟时,师长捷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目送他们的车远去。老人身后,是他守护了46年的石窟。王凯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夜色。

后来他常想起那个画面。1600年来,有多少人像师长捷一样,守着这些石头,一代又一代,无人知晓。石窟沉默,他们也沉默。但正是这些沉默的人,让石窟开口说了话。

王凯还在这条路上走着。从兰州到北京,从敦煌到云冈,从法显到玄奘,从师长捷到他自己。他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走,这条路,就永远不会荒芜。



## 面孔



### 于漪：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

97岁的“人民教育家”于漪3月14日在上海逝世。从教七十余载,她开设了近2000节公开课,写下600多万字论文专著,是无数中国教师的偶像。

于漪生于江苏镇江。小学时,因日本侵略者入侵,学校被迫解散。最后一节音乐课上,老师与同学哭着唱《苏武牧羊》,这段经历让于漪一夜长大。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于漪成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一名历史老师。1958年,因工作需要,领导希望她转行教语文。彼时她拼音还认不全,只好边教边学。她立下“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的规矩,备一篇课文,要花费十小时、二十小时。20世纪70年代末,她主讲的《海燕》语文电视直播课,声情并茂,时人赞叹“这不是上课,是用生命在歌唱”。于漪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但她眼中没有差生,“不要随便讲学生不好。我教了一辈子,真的觉得没有不好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1995年,她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基本特点”,观点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2019年,她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高负荷工作让于漪受到胃溃疡、肝炎、心脏病等疾病的困扰,但她仍坚持在基础教育第一线。“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是于漪的名言,更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她曾这样阐述教育的使命:“教育是滴灌生命之魂,一是德性,二是智性;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



### 祝勇：中国书写故宫第一人

祝勇,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纪录片导演。近日,他的《国宝》三部曲第三部《亿兆斯民》正式亮相。这部逾八十万字规模的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以那文松等故宫人的命运沉浮为主线,真实还原了文物南迁的艰辛历程。“一个作家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以这么多文字来书写一个地方,祝勇应该是在中国书写故宫的第一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

从重返故宫文物南迁路,筹备纪录片,到创作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再到最新小说《国宝》,祝勇与故宫南迁文物渊源颇深。“这群在战乱中守护文物的故宫人的一生,几乎囊括了20世纪的国家命运。每当我面对他们的旧照片,都会被他们面容的平静所感动。”

2011年,祝勇进入故宫工作,办公地点“南三所”成了他在故宫中最熟悉的建筑。“我在那里读书、治学、工作,度过了好几个春秋,见证了故宫的风霜雨雪,感受故宫的生命律动。我把故宫的历史,与我个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这些年来,祝勇撰写《故宫六百年》《纸上繁花》《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看见中国史》等作品,构建起一座“纸上的故宫”。



### 田沁鑫：黑马导演的艺术人生

“文化原创力的未来,注定是科技与艺术‘跨界’‘共生’的协奏——我们要积极拥抱技术进步,更要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以中国人的智慧培养人工智能(AI)。”近日,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一级导演田沁鑫公开发表关于科技创新与艺术发展的看法。

田沁鑫是中国当代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戏剧导演,被誉为“中国舞台剧中一面始终坚持文化品质、坚持人文情怀不倒的旗帜”。1999年,她因编写、导演话剧《生死场》一举成名,被业界视为中国当代最有潜力的舞台剧导演,其舞台风格具备了熔铸西方现代派戏剧观念与东方传统审美精神的强悍、凌厉。此后数十年间,田沁鑫进行了广泛尝试,从艺术戏剧到商业戏剧,从现代派到传统风格。她说:“戏剧因题材而定形式,所以说我不量力,什么题材都可以试试。”她不受文本束缚,在《断腕》《驿站桃花》《狂飙》《赵氏孤儿》等剧中,以一人之力完成从编剧到导演的整个创作过程。

田沁鑫对中国式演剧观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式演剧观的根植于中华文脉。“我做戏剧,基本都是在做正剧,都是在讲中国故事。我很坚持四个字,就是‘守正创新’。”(□记者 梁雯 整理)